



中山大学985工程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丛书

主编 ◎ 舒 元

蔡荣鑫 ◎ 著

中国省区经济增长论丛

“益贫式增长” 模式研究

13.4
57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内 容 简 介

本书首先回顾人们对贫困认识的深化和经济增长理念的演进过程;然后系统介绍和比较各种“益贫式增长”的定义和衡量方法,以及“包容性增长”的相关理论和政策体系。在此基础上,本书分别对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四国是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进行研究,总结各国相关经验和教训,并归纳“益贫式增长”模式的内涵,以及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所需的良性循环机制,讨论“益贫式增长”模式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之间的联系。最后,本书分析我国经济中与“益贫式增长”模式相关的问题,并讨论“益贫式增长”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之间的关系。本书对于国内学术同行、政府部门了解“益贫式增长”的理论进展、促进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以及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本书可作为高校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书。此外,关心经济增长和贫困问题的读者朋友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益贫式增长”模式研究/蔡荣鑫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中国省区经济增长丛书)
ISBN 978-7-03-025835-9

I. 益… II. 蔡… III. 经济增长-研究-世界 IV. F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9755 号

责任编辑:马 跃 / 责任校对:鲁 素
责任印制:张克忠 / 封面设计:耕者设计工作室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cp.com>

双 青 印 刷 厂 印 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8 3/4

印数:1—2 000 字数:164 000

定价: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总 序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大庆之年。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经济增长发展的成就令人瞩目。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发展的问题不断出现。探索和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发展的内在机制，把握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向，已成为决策者和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历了和经历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迁。这为经济学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经济科学实验场。中国在经济增长发展过程中遇到许多新问题，也不断产生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为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与方法创新提供了大量的现实例证。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作为国内经济增长教学和科研的中坚力量，一直努力探索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并服务于全国和地方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岭南学院注重教学科研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化特色鲜明，可谓逢“天时”；珠三角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岭南学院依托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环境，近距离地观察研究，为珠三角建设国际化都市群提供智力支持，可谓占“地利”。岭南学院在探索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上具有“天时”、“地利”，必将有所作为。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中国省区经济增长》丛书是中山大学“985工程”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产业经济与区域发展研究”的部分成果。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经济差距的成因，已经发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扩散等一个长长的相关因素清单。如果说，这些因素与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绩效密切相关，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这些因素的高低呢？更确切地说，设计什么样的激励，经济活动主体才会自发地积累资本，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研发，从而把“蛋糕”做大呢？到目前为止，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并没有为此提供明确的、具有共识性的答案。中国的经济增长实践，无疑是回答上述问题的最佳案例。《中国省区经济增长》丛书不奢求能够完全回答上述问题，旨在较系统地梳理中国经济增长故事，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有益的线索，同时力争提供部分有益的探索成果。

才国伟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分析》主要是定量分析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978年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区域差距不断拉大。是什么原因带来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距呢？在这一论著中，作者结合增长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等相

关理论和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透彻的论述。论述过程贯穿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主线:从要素投入到制度安排,进一步阐述了国家为什么会实施这样的制度安排。我国市场化改革、教育融资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制度安排,有利于东部地区优先发展;依赖于空间距离的区域相互作用机制又进一步拉大了区域差距;中央从全国经济福利考虑,采取了“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一靠市场孕育,二靠政策调整,等等。

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分析是一个重要的话题,黄新飞的《国际贸易与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和周吉梅的《技术进步与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则分别从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的视角对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决定因素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梳理。这些研究工作,一方面是对现有理论的深化和扩展,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当前或即将出台的区域政策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从论证方法来看,这些研究更加注重从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出发来分析宏观总量的运行规律,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理论模型的构建上。从典型事实到理论模型,再到实证分析,作者遵循了规范的学术研究模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的判断已经成为共识。另外,皮特·霍尔发现世界出现越来越多“尖”的区域,也得到广泛的认同。“世界是平的”体现了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世界是尖的”表现了经济高度集聚的过程。在当今世界,快速增长的城市、全球范围内的人口与货物流动,以及越来越多的区域一体化地区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经济不断向城市集聚,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基础设施得到改善,进一步加强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使经济得到持续增长。这是一种具有某种程度规模报酬递增性质的良性循环,在全球范围内,由城市发展形成的一体化区域正成为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地区。城市化、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李郁、徐现祥的《城市化、区域一体化与中国省区经济增长》以中国的城市化、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过程和动力机制,增进人们对如何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解。

如果说制度、政策等是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发展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那么作为这些制度、政策的执行者和落实者的地方官员将会在经济增长发展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徐现祥、王贤彬的《地方官员与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对此作了初步回答。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显示,中国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一个非常积极、重要的角色。从地方官员入手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乃至经济差距的源泉将是一个很好的新的研究视角。该书基于1978~2005年全国各省区市省长、区长、市长、省委书记、区委书记、市委书记样本,系统地识别、测评了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回答如下问题:地方官员是否显著地影响了辖区经济发展?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地方官员对辖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多

大? 这种影响的特征及其机制是什么? 定量识别、理解地方政府官员对省区经济行为及其发展绩效的影响, 将为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和省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新的研究视角, 可以从更深层次上解释我国各省区经济行为、发展模式及其发展绩效的差异。另外, 探索地方官员对省区经济行为及其发展绩效的影响还可以引申到更广泛的一些研究领域, 如研究地方官员与中央政府在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中的激励兼容问题, 地方官员激励、考核、晋升等治理问题等。

王曦、舒元的《科技创新与循环经济——以广东为例》首先回顾了科技创新和循环经济的相关理论, 并对广东省经济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的现状与政策进行了总结。广东经济结构正处于由轻工业、加工制造业向重工业、装备制造业转移的时期, 钢铁、石化、汽车等重工业发展势头迅猛, 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 广东省的资源能源消耗急剧攀升, 环境保护形势严峻,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遭遇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瓶颈。该书对科技创新系统和循环经济系统进行细分,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 构建了科技创新和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并利用其对广东省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实行科技创新和循环经济的进程水平作出评价。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该书提出了“构建科技创新的多元化融资体系, 构建科技创新的人才支撑体系, 完善鼓励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手段, 加强法制建设, 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 建立配套的经济政策体系和激励制度, 加快适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等有效推动广东省科技创新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及措施。

通常而言, 经济增长是治理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增进人民福祉的根本途径。蔡荣鑫的《“益贫式增长”模式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该书首先回顾人们对贫困认识的深化以及增长理念的演进过程, 讨论二者间的联系。然后介绍和比较各种“益贫式增长”的定义和衡量方法, 并阐述“包容性增长”的相关理论和政策体系。在此基础上, 对越南、印度、印尼、巴西等四国是否以及如何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进行案例研究, 分析相关经验和教训, 并总结“益贫式增长”模式的内涵及相关机制, 讨论“益贫式增长”模式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联系。最后分析我国经济中与“益贫式增长”模式相关的问题, 并提出相关政策选择。该书强调指出, 为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 一国必须努力实现较高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 增加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过程的机会, 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能力, 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者, 而非单纯依赖社会保障和救济的受助者。要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过程, 经济增长本身必须能持续自发地形成大量劳动需求, 这显然涉及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 即采取什么发展战略、依靠什么资源要素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比较优势的具体体现,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益贫式增长”模式中具

有重要战略地位，在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等方面意义重大。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我曾有幸在改革开放初期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并由此开始了我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持续跟踪和研究。除了学术研究以外，传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培养优秀研究生、培育理论研究队伍也是我长期以来的主要工作。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在岭南学院我们已形成一支从事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教学科研的优秀学术团队。在中国科学出版社的协助下，在中山大学“985工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等项目的支持下，我们近期有关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和发展研究成果的系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谨致以我们衷心的感谢。丛书中的不足之处，恳请各位经济学界同行和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愿丛书的出版，能够为中国经济增长发展提供某些有效的智力贡献，愿中国永远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舒元教授

2009年10月

目 录

总序

第1章 引言	1
1.1 我国贫困减除工作所存在的两大问题	1
1.2 研究“益贫式增长”模式的意义及思路	4
1.3 本书的结构安排	5
第2章 从“增长”到“益贫式增长”	7
2.1 贫困认识的深化	8
2.2 增长理念的演进.....	10
2.3 “益贫式增长”：不同定义的比较.....	16
2.4 衡量“益贫式增长”：不同指标的比较	19
2.5 从“益贫式增长”到“包容性增长”：一个拓展	30
2.6 本章小结.....	35
第3章 越南“益贫式增长”的实践与经验	36
3.1 越南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概述.....	37
3.2 贫困减除与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分析.....	42
3.3 越南实现“益贫式增长”的经验.....	47
3.4 本章小结.....	49
第4章 印度“益贫式增长”的实践与经验	51
4.1 印度独立以来的经济增长概述.....	52
4.2 贫困减除与不平等的变化.....	55
4.3 印度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分析.....	60
4.4 本章小结.....	68
第5章 印度尼西亚“益贫式增长”的实践与经验	69
5.1 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来的经济增长概述.....	70
5.2 不平等的变化以及贫困减除的成效.....	75
5.3 印尼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分析.....	77
5.4 本章小结.....	81
第6章 巴西“益贫式增长”的实践与经验	83
6.1 巴西经济增长概述.....	84
6.2 贫困减除与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分析.....	87

6.3	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益贫性”	91
6.4	社会保障支出与税收负担	94
6.5	本章小结	96
第7章	“益贫式增长”模式的内涵与机制	98
7.1	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的国际经验	98
7.2	“益贫式增长”模式的内涵与机制	100
7.3	“益贫式增长”模式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103
7.4	本章小结	105
第8章	“益贫式增长”模式与中国的相关问题	107
8.1	“益贫式增长”模式与中国“三农”问题	107
8.2	“益贫式增长”模式与中国城镇就业和产业发展问题	109
8.3	实现“益贫式增长”、建设和谐社会	113
8.4	本章小结	115
第9章	结束语	117
9.1	主要结论和观点	117
9.2	创新与不足	119
参考文献		121
后记		129

第 1 章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在贫困减除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成就。以农村贫困减除的情况为例,根据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数据,按照中国官方贫困标准衡量,在 1978 年至 2007 年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已从 2.5 亿下降到 1487 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 30.7%下降到 1.6%。2000 年到 2007 年,温饱问题已解决但发展水平依然较低的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数量从 6213 万减少到 2841 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相应地从 6.7%下降至 3%。与此同时,中国的扶贫开发也为全球减贫作出重要贡献,在 1990~2007 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数量占同期全球贫困人口减少数量的比重超过 70%,并成为全球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目标的国家之一(郝亚琳等,2008)。上述数据无疑令人感到鼓舞,但在我国贫困减除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相关问题,需要引起决策层、执行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

1.1 我国贫困减除工作所存在的两大问题

首先,我国贫困线标准的调整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并低于国际标准。2009 年 3 月前,中国所采用的绝对贫困线标准为人均纯收入 785 元以下,低收入贫困线标准为人均纯收入 786~1067 元,离此前普遍使用的日人均 1 美元的国际标准还有一定距离。事实上,自 1986 年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开发性扶贫工作以来,尽管成就显著,但贫困线标准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并且与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日益拉大。表 1-1 给出了 1985 年至 2007 年我国贫困线标准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张磊,2008;国家统计局,2008)。

表 1-1 1985~2007 年我国贫困线标准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年 份	贫困线标准(元)	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1985	206	398
2000	625	2 253
2004	668	2 936
2005	683	3 255
2007	1 067	4 140

由表 1-1 可见,1985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贫困线标准的 1.9 倍,2005 年,这一数据扩大到 4.8 倍,2007 年,由于贫困线标准已上调到 1067 元,

这一倍数有所下降,下调为 3.9 倍。这些数据反映我国贫困线标准的调整滞后于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中国贫困线标准偏低,上述反映我国贫困减除成就的数据存在低估中国实际贫困状况以及贫困人口数量的问题,使得我国官方估计的数据与国际机构公布数据间存在较大差距,不利于国际比较。举例而言,在《2005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正式公布,以 1 天 1 美元的标准衡量,中国 2001 年的贫困发生率是 16.6%,按 1 天 2 美元标准衡量则为 46.7% (World Bank, 2004)。而当年国家统计局按农村贫困标准衡量,公布的农村贫困发生率是 3.1%,按低收入标准衡量为 9.7%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2002)。这样的一种情况,使得人们对于中国贫困问题缓解的幅度、当前的贫困程度和贫困人口规模等关键问题意见分歧 (王萍萍等, 2006)。

基于上述现实,2008 年年底,我国宣布上调扶贫标准,把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取消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区别对待的政策。2009 年 3 月中旬,我国进一步宣布实施人均纯收入 1196 元的扶贫新标准,这是在 2007 年 1067 元低收入标准的基础上,根据 2008 年度物价指数做出的最新调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 年在这个标准以下的扶贫对象为 4007 万人,扩大近 1.6 倍,扶贫对象增加约 2528 万人 (蒋晓华, 2009)。然而,与国际标准相比,这一新划定的贫困线依然偏低。

2008 年,考虑到全球通胀和粮食危机的影响,为更加准确地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成本,世界银行制定了每天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的新贫困线标准。根据这一新标准,世界银行最近采用 2005 年直接问卷调查数据估算了当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字,按当年美元购买力平价,2005 年中国仍然有 2.54 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线,这一贫困人口数字远高于中国官方估计的农村 1500 万贫困人口;此外,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 (World Bank, 2009)。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减除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除了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期贫困减除出现止步不前情况外,即使在经济持续增长时期,也存在经济增长的贫困减除效果持续下降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水平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我国贫困减除的进程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一致性。例如,1980~1988 年的经济增长导致农村贫困人口急剧减少,贫困率由 40.65% 下降到 7.99%,然而,在 1994~1998 年,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保持了相似的增长速度,但贫困减除速度却在下降,贫困率仅由 10.41% 下降到 3.24%;1998~2000 年更是出现贫困率上升的反常现象 (陈立中等, 2007)。也有学者认为,1985 年至 2001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效地减少了贫困,但由于收入不均等状况在同一时期恶化,限制了经济增长带给贫困人口的潜在福利,也降低了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效果 (林伯强, 2003)。还有学者指出,在 1984~1987 年,农村实际收

入增长幅度达到 6.3%，但贫困反而上升了。这主要是因为在这段时期内，农村收入分配发生了严重不利于贫困人口的变化，对贫困人口的不利影响完全超过了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这一情况并没有改善，在 1990～1992 年和 1996～1997 年两个时期的农村，以及 1992～1993 年和 1996～1997 年两个时期的城镇均发生了上述情况（张全红等，2007）。

此外，有研究认为，中国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单纯依靠经济高速增长以减少贫困的时期已经过去。除经济增长之外，收入分配对贫困减除效果的影响很大，例如，1985～2003 年，分配状况的恶化就部分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胡兵等，2005）。有学者对近年来我国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虽然经济增长对提高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具有积极影响，但收入分配效应部分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并且分配效应有恶化的趋势，增长效应也趋于减弱（纪宏等，2007）。

针对上述研究所揭示的经济增长减贫效应下降以及收入分配效应抵消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改善收入分配、加强社会保障等政策建议（张全红等，2007；纪宏等，2007）。此外，也有学者采用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①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pro-poorness）”问题，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阮敬等对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各阶段经济增长的“益贫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能够自动缓解贫困，现阶段应充分考虑分配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的结合使用，使经济增长与分配效应在一定的比例下相互弥补，在合适的收入差距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同时采取瞄准式扶贫措施（纪宏等，2007）。胡兵等的研究则发现，1985～2003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并非是对穷人有利，农村穷人从改革和增长中的获益少于富人，这种收入分配上不利于穷人的变化，部分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同时，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相对加深。他们提出，要让穷人参与到经济发展中来，让穷人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促进“益贫式增长”（胡兵等，2005；2007）。

然而，上述研究虽然正确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必然自动惠及穷人以及自动地改善分配状况，经济增长只能是贫困减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强调要关注收入分配恶化及其对增长的减贫效应的影响，但这种认识大多仍然停留在经济增长为主、收入分配为辅的认识阶段，倾向于通过二次分配纠正一次分配造成的问题。这样的认识显然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因为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收入分

① 国内有学者将“pro-poor growth”译为“减贫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亲贫困增长”、“惠及穷人的经济增长”，笔者曾译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为表述方便和行文简洁，本书统一采用亚洲开发银行的译法“益贫式增长”。

配体制仍然会不断产生收入分配的差距。事实上，正是基于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持续存在、目前仍无法根本扭转这种客观事实的认识和反思，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胡锦涛，2007）。而要实现初次分配的公平，显然涉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问题。

其次，尽管上述研究正确地提出应让穷人参与到经济发展中来，让穷人更多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促进“益贫式增长”，但上述研究大多只是采用某种衡量“益贫式增长”的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或某些时段的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进行实证分析，对“益贫式增长”的必要性、必然性缺乏必要的论证，同时对“益贫式增长”的相关理论也缺乏系统的认识。考虑到我国的扶贫任务仍然艰巨，而目前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不断弱化的现实，重要的问题或许并非只是停留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是否益贫的层面上，而是要集中关注我国是否应该实现“益贫式增长”，以及如何实现“益贫式增长”的问题。

1.2 研究“益贫式增长”模式的意义及思路

要回答上述问题，无疑需要对“益贫式增长”及其模式的内涵、实现机制、相关特点，以及实现“益贫式增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有完整和正确的认识。此外，鉴于国内学术界只是在近两年才开始关注和讨论“益贫式增长”，相关的研究仍然属于引入概念、方法和据此进行初步实证分析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益贫式增长”模式的相关理论发展，分析和借鉴国际上在实现“益贫式增长”方面表现良好国家的经验以及表现较差国家的教训，总结和归纳“益贫式增长”模式的内涵和实现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讨论中国的相关问题，无疑是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选题。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将首先结合人们对贫困认识的深化过程，总结国外学术界和国际机构从单纯强调“增长”到重视“益贫式增长”的思想演变，分析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介绍和厘清各种“益贫式增长”的定义、归纳和比较各种相关的衡量方法。这方面的介绍既为后文对国际案例的研究作出理论铺垫，同时也为国内已经开始关注“益贫式增长”相关研究的学术同行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总结和评析。就笔者认识所及，本书可能是国内率先将贫困认识的深化与增长理念的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全面系统地总结和评析“益贫式增长”相关理论的研究，对于国内学术界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这方面的理论进展，促进我国“益贫式增长”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有一定参考意义。

在此基础上，本书拟根据相关理论，选取越南、印度、印尼以及巴西四国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和总结这四个国家是否和如何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相关

实践和经验教训。选择这四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其中:越南与我国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并都通过持续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实现了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而且目前均处于体制转轨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发展时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印度、印尼、巴西与中国都是人口、经济和地理上的大国,也同样面临诸多相似问题。以人口为例,目前,中国、印度、印尼、巴西人口数量分别居于全球第1、2、5、6位,这四个国家人口总量加起来占全世界人口的43.4%,而且这些国家的贫困减除任务依然繁重、都还存在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这些国家在贫困减除方面的进展或停滞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全球贫困减除目标的实现。其中,印度与巴西这两个国家与中国一样,同为“金砖四国”的成员,而且这些国家的经济正处于重要发展阶段,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良好发展态势,未来经济增长前景令人乐观;另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问题也令人关注(谷宏伟,2007)。这些共同的特征以及相似的问题使得印度和巴西的经验和教训更加值得重视和借鉴。印尼则因其长达近30年的“益贫式增长”实绩而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高度赞誉,其中的经验显然不容忽视,值得研究。就笔者认识所及,这将是国内首项针对“益贫式增长”模式和国际经验的研究。研究越南等四个国家与“益贫式增长”相关的实践,总结其相关经验与教训,无疑可以为我国关于“益贫式增长”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案例,并从中得到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1.3 本书的结构安排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拟从以下四部分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部分是理论介绍和分析,首先梳理人们对贫困认识的深化以及增长理论的演进,讨论两者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分析“益贫式增长”理念的形成;其次,介绍和比较“益贫式增长”的定义和衡量方法。作为一个拓展,本书还将简要介绍“包容性增长”理念及其政策体系,并讨论其与“益贫式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期对这个理论热点感兴趣的学术同行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总结及评析。

第二部分是国际案例研究:介绍和分析越南、印度、印尼、巴西四国是否和如何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并总结相关经验或教训。在每一个案例研究中,本书均会首先回顾该国20世纪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历程,然后分析其不平等的变动以及贫困减除方面的绩效。在此基础上,本书将分析和讨论该国在“益贫式增长”方面的表现,并对该国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益贫性”的具体制度、政策和措施进行分析。

第三部分将结合理论分析和“益贫式增长”模式国际经验的研究、归纳“益

贫式增长”模式的内涵与实现机制，讨论其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联系，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相关情况，讨论在我国实现“益贫式增长”模式的一些相关问题。

第四部分总结本书的主要结论和观点，并指出本书的创新和不足。

为给国内学术同行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关于各种衡量“益贫式增长”指标的介绍，本书第 2 章 2.4 节具体评析了相关指标，由于涉及较多公式，技术性较强，对此不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略过这部分内容，不必担心会影响对其他章节内容的阅读和理解。

第2章 从“增长”到“益贫式增长”^①

经济发展无疑是各国所追求的目标，然而，由于经济增长、不平等状况的改善、以及贫困减除都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这三个目标中，哪一个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一度引起人们的争论。随着讨论的深入和认识的发展，人们逐渐对上述问题达成一些共识：首先，绝对贫困的快速消除显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其次，为实现快速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各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而制定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和分配政策显得十分必要。事实上，贫困减除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均采纳了贫困减除战略文件（the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 PRSP）即为明证^②。

随着贫困减除实践的推进，人们对贫困本质及其成因的认识不断深化，贫困的内涵也不断拓展，并促使人们相应审视既往增长模式及相关发展战略的得失，尤其是这些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在贫困减除方面的表现。然而，将贫困减除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使得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因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们早已习惯了专注于实现经济增长，但现在人们需要增加一种关注，即什么人将从经济增长中得益、增长是否能够促进多维度的贫困减除，并以此衡量增长对贫困减除的影响。由于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要顾及增长的分配效应及其对多维度的贫困减除的影响，决策者需要认真研究和区别对待各种与不同的贫困减除战略和效果相联系的增长模式。

其次，以贫困减除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使得人们对于政策的分配效果以及不平等的决定因素重新产生兴趣，原因在于：尽管不平等与贫困是明显不同的问题和现象，但它们却是紧密联系的。上述认识的转变成为“益贫式增长”理念形成的思想基础。

本章2.1节首先回顾贫困认识的深化过程；2.2节介绍增长理念的演进过程，以及其与贫困认识深化过程的联系；2.3节介绍和比较“益贫式增长”的各种定义；2.4节介绍和比较“益贫式增长”的各种衡量方法；作为对本章内容的一个拓展，2.5节介绍在“益贫式增长”理念基础上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思想

^① 本章部分内容曾以《从‘增长’到‘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为题，发表于《经济学家》2007年第6期。

^② PRSP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的内容之一，阐述了相关政策方法。

及其政策体系,并简单讨论了目前“包容性增长”相关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最后是本章总结。

2.1 贫困认识的深化^①

贫困的持续存在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威胁和挑战,因而理所当然成为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必须共同面对和致力解决的问题。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得到192个会员国的坚定承诺,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共识和协同努力^②。

贫困减除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对贫困内涵、起因等关键性问题有清晰和准确认识。然而,这方面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贫困减除实践的推进而不断深化;与此相应,各国贫困减除战略也需要随之不断调整优化。作为贫困减除的必要条件和主要手段,经济增长在各国贫困减除战略中均居于核心地位,增长的模式、速度、增长成果的分享以及相应的不平等变化等因素均深刻影响贫困减除战略的效果。对贫困认识的深化影响各国贫困减除战略的制定和调整,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及其在贫困减除中作用的认识和要求,从而推进了增长理念的演进。

19世纪末以来,人们关于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从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到权利贫困的深化过程。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是指总收入水平不足以获得仅仅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住房和其他项目等。这种贫困概念主要考虑物质的缺乏(material lack),关注的是能否满足穷人生存需要(subsistence need)。这种绝对意义上的收入贫困概念是19世纪末英国营养学者们研究工作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家也根据类似思路做过相关研究。这种从物质缺乏角度考虑生存需要的贫困概念曾长期主导国际社会的扶贫努力和各国的政策实践,但这种观点也由于只关注贫困人口低水平的物质和生存需要而广受批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转而关注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basic needs),并提出相对贫困(relatively poverty)的概念,认为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源,虽然可以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但不足以使其达到社会的平均生活水平,通常只能维持远低于平均经济活动

① 本节和本章2.2节的部分内容曾以《贫困认识的深化与增长理念的演进》为题,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8月22日第34期。

② 《千年发展目标》包括在2015年前实现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减半、普及小学教育等八项目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登录联合国相关网页 <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了解该计划的相关内容以及各国在实现千年计划方面的进展。

水平的状况。相应地，人们提出相对剥夺（relatively deprivation）的概念，强调贫困人口应拥有参与社区发展的一些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不单涉及收入、还包括物质及社会资源等（Townsend, 2006）。

Amartya Sen 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一系列研究则将人们对贫困的理解带人一个新阶段，他所提出的能力贫困（capacity poverty）理论关注人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可以是什么或不可以是什么（what we can or can not do, can or can not be）”，从而将对贫困原因的解釋从经济因素扩展到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等方面^①。在 Sen 看来，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得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其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造成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原因是他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受到剥夺（capability deprivation）；低收入是导致贫困人口获得收入能力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素，疾病、人力资本不足、社会保障系统软弱无力、社会歧视等都是造成人们收入能力丧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Sen A, 1976; 1981; 1983; 1985）。受到 Sen 的理论启发，其后有学者提出了净收入能力贫困（net earning capacity poverty）的概念，关注在充分利用成年人的智力和体力资本后，是否能获得等于或大于贫困线标准的净年收入流（Hanveman R et al., 1998）。

20 世纪 80、90 年代，为纠正既往理论研究和贫困减除实践忽视贫困人口主观能动性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开始试图从穷人的角度来看待贫困，从而将贫困概念扩展到权利贫困（entitlement poverty）。这种观点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和支出水平低下，也包括人们发展能力（教育、健康和营养等方面）的低下，而且贫困还包括了脆弱性、无话语权、无权无势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等因素，从而反映了关于剥夺的多维视角（multi-dimensional view of deprivation）。权利贫困理论认为，穷人不仅在物质上受到剥夺，还受到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剥夺，缺乏法律的保护、不受尊重、被禁止利用新的经济机会；一个人如果被排斥在主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活动之外，即便拥有足够的收入、足够的能力，也可能依然很穷。

与上述贫困认识深化过程相一致的是，经济学家们相继研究和构造出一系列确定及衡量贫困的方法和手段，包括货币方法（the monetary approach）、能力方法（the capability approach）、社会排斥方法（the social exclusion approach），以及参与方法（the participatory approach）（Laderchi C R et al., 2006）^②。

随着对贫困认识的深化，人们自然会对既往贫困理论和相应的贫困减除战略

① 为方便读者查阅文献，本书在引用或注释时，国外作者名字均直接采用英名。

② 社会排斥方法与参与方法都是基于权利贫困理论，前者试图描述边缘化（marginalization）以及剥夺的过程，而后者则关注如何令贫困人口参与贫困界定以及贫困减除实践的决策和执行。